

保尔森基金会与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共同举办中美论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增长

作者：艾鼎德

2015年5月21日



左起：皮特·奥格登、伊丽莎白·莫耶、王丽涛、迈克尔·格林斯通和邹骥（摄影：罗伯特·科兹洛夫/芝加哥大学）

经济越发展，使用的能源就越多，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其令人不安的程度并不仅仅因为事实如此而有任何减少，特别是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时候。所以，当芝加哥大学的大气科学副教授伊丽莎白·莫耶在该校举办的中美气候论坛上展开讨论的时候，她通过图表说明了过去数百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传递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图中的点簇一直向上攀升，反映了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

该图表并不预示着未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雄心壮志：随着中国走向繁荣发展，即使中国可能秉持节能的良好意愿，其能源消耗将继续增长。更重要的是，目前煤电约占中国全国总发电量的80%，如果中国的能源消耗继续依赖产生碳排放的煤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莫耶用更多的幻灯片来说明对气候的巨大影响，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并最终给中国地势低洼的沿海城市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会通过节能找到出路”，莫耶说，“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能源来源”。

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保尔森基金会和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5 月 19 日共同主办了这个中美论坛，中美两国的专家们在会上进行的讨论和演讲可以说再迫切不过了。学者们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的专家、政府领导和商界领袖都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能源挑战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经济转型问题。他们指出，中国在 2014 年 11 月签署的中美气候协议中承诺到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国方面有新的意愿与美国展开合作，甚至可能为其他国家树立效仿的榜样。

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介绍了他有关中国的碳排放带来的健康影响的开创性研究。他研究了中国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居民的预期寿命，因为淮河是中国划定燃煤供热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地区没有政府提供的免费供热。）根据格林斯通的研究，淮河以北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淮河以南的居民短 5 年。“全世界都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环保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格林斯通说，“能源的价格应该反映其在健康和气候方面造成的损害”。

河北工程大学的空气污染问题专家王丽涛介绍了中国为减少空气污染（PM2.5 细颗粒物排放）而设定的积极目标。到 2017 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要减少 25%，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减少 20%，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减少 15%。她指出，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邯郸（王丽涛的家乡）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2014 年 PM2.5 排放量减少了 17.5%，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关停了一些低效的小型燃煤电厂。“我很乐观，因为地方和中央政府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王丽涛说。

中国将如何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著名气候问题专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表示，由于大约 3 亿农村居民将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迁入城市，中国正在从开发新技术到推动低碳城镇化的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但在此期间，邹骥说，中国无法关停就目前而言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燃煤电厂。他补充道，“中国拥有最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在排放方面与燃气发电相差无几。“我们需要设计合适的策略”，他说，“价值判断的变化将有助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从某种程度上必须推动减少个人能源消耗，而不是更多。

根据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杨大利提供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这可能并不容易。据调查，环境问题在中国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題中甚至都排不到第二、第三或第四位。（贫富差距和腐败是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不过，杨大利指出已经出现了代际变化，不同收入群体中有更多 17-29 岁的年轻人比年长的群体更关心环境。

上午论坛活动的最后一项是由格林斯通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进行有关中国的内容广泛的对话。保尔森指出，保尔森基金会正致力于在中国实地开展可持续城镇化以及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保尔森说，“我们有大量分歧，但同时也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如果我们不相互合作，就更难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取得进展”。保尔森称近期达成的中美气候协议“举世瞩目”，补充说“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环境和经济风险。中国领导人十分注重这方面的工作”。